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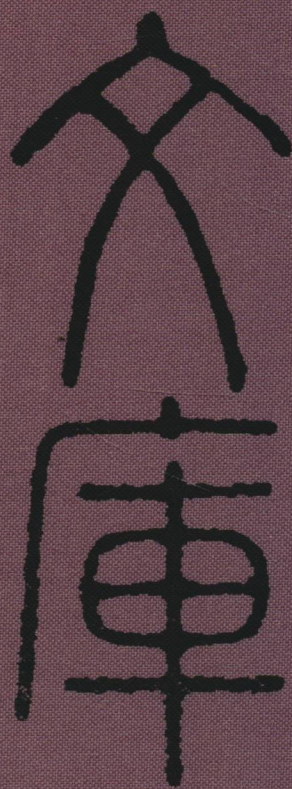


李永春 编

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3
1

李永春
编

湖南新文化运动史料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谢清风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区域内创造的反映一定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的总和。这些成果包括理论思维的成果即知识系统，也包括社会心理与民族精神系统。具体而言，包括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思维方式、文学艺术、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状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等。^①今天所用的“文化”一词，则是近人在译介西方英文 culture、拉丁文 cultura 等词汇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固有文化内涵而成的。

中国文化有新旧之别，一般来说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或古代文化，以后的文化称为现代文化或新文化。所谓古代文化、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旧式农业文化，其特点是借助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以确保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表现为以“礼”为中心的重义轻利、重实轻虚、重本轻末的文化心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面临着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也产生了中国的新文化。台湾学者马宝珠所著《中国新文化运动史》认为：综观中国新文化运动史，自启蒙文化始，中经洋务文化，后经维新文化，发展为革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下，逐渐出现了从冲突到融

^① 王继平：《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 页。

汇的趋势，传统文化出现了漂移现象，不再是一个封闭圈，而是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既不同于旧有的封建文化，也不同于西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新文化。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型文化形态，既保留了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合理内核，表现为中华民族反抗封建文化，创立民族自强、自尊、自立的民主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形成，是与中国近代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也是与思想文化运动中的争论与吸收、冲突与融合等分不开的。^①

- 2 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但是并未真正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未能把民主共和的观念真正深入到民众心里。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封建专制主义又成为军阀政权的精神支柱，加上政治制度上的帝制复辟，意识形态上的尊孔复古思想，使中国仍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乘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发展壮大。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过去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多数国民不觉悟，当前救国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壁垒，解除它对人民的重重束缚。因此他们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发动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猛烈的思想文化运动，目的就在于启民主、科学思想之蒙，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一运动以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为标志。《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新文化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① 马宝珠：《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三) 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 世界的而非本国的；(五) 实行的而非虚文的；(六)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也就是从封建主义文化中解放和创造资本主义新文化。

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通行的说法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个性解放，提倡新教育，以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研究新思想新文化，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与方法。其实，这种理解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五四时期人们的界定或者理解相距甚远。如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包括研究各种问题、输入各种学理两个方面。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概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为：我们随便翻阅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新报纸，便可以看出两种趋势：在研究问题方面，我们可以指出孔教问题、文字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礼教问题、教育改良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方面，我们又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广州《民风周报》等等杂志、报纸所介绍的种种西洋学说。^① 1919年11月江苏省教育会组织各校演说“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其题解为：1. 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其进行方向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共和国体日形巩固。2. 新文化运动要文化普及于大多数之国民，不以一阶级一团体为限（例如

3

^① 见《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推广注音字，传播白话文，设立义务学校，演讲团都是这个意思）。3. 新文化运动是以自由思想、创造能力来批评建设新生活（例如现在各种新思想出版物）。4. 新文化运动是谋永远及基本的改革与建设，是要谋全国彻底的觉悟，继续现在的新文化，从基本上着想使之永远进步也。5. 新文化运动要全国国民改换旧时小的人生观而创造大的人生观，使生活日就发展（例如从家庭的生活到社会的生活）。6. 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① 按照陈望道对五四时期中国思潮的回忆：“‘五四’前，新文化内容很杂，凡是中国所没有的，都受欢迎，认为是‘新’的。那时候，只问新旧，不管内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国外来的思潮，同被列为新文化。”^② 从上可以大致归纳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涵，包括民主运动、科学运动、文字改革、文学革命、道德革命、婚姻问题、礼教问题、教育问题、文化传播、劳工运动、社会主义研究与宣传等等方面。其中一些新的主张新的动向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主张道德革命，主张学界革命，主张儒学革命，主张家庭革命，主张个性革命人格独立，等等。由此来看湖南新文化运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以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主义的人生观和宗法礼教、人格独立、妇女解放等；以科学和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反对宗教运动；“社会改造”的讨论；劳工运动的提倡；社会主义的介绍与研究、争论；文学革命与艺术改良；新教育运动；创办新书报杂志和书社书店、通讯社、图书馆；建立新社团组织。

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大致以 1914 年创办宏文图书社及其

^① 天津《大公报》1919 年 11 月 5 日。

^②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9—20 页。

附办的《公言》杂志和1915年9月创刊长沙《大公报》为主要标志，在时间上比上海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还要早。1914年年初，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曾运乾、陈天倪等人创办宏文图书社，内设编译所，主要是编辑“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和“翻译东西著述”。同年10月，该社又创办《公言》杂志，宣言将“选译东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现“刷新社会”，作为“救亡至计”。可见，宏文图书社及其编译所，以翻译东西论著、刷新社会、挽救民族危亡为目标。1915年7月，原《湖南官报》的一些编辑人员脱离官报，开始酝酿出版新的报刊。到9月1日，刘人熙、贝允昕、张秋尘、龙兼公、李抱一、张平子等创办《大公报》。该报《发刊词》宣布其“爱国救民”的追求，其中说到：

“堂堂民国，轶汉超周。中外一家，报速置邮。上告政府，下达乡间。夕印万纸，晨布五洲。星驰电掣，息剿补黥。报界天职，贵莫重焉。目营四海，畴克仔肩。自营为私，背私为公。公易岂言，雉曰大公。窃取斯义，鸣鼓自攻。匪曰能之，誓除害马……凡我报界，天职同尊。气求声应，爱国救民。”^①

该报《创刊宣言》也表明其为民请愿，以言论报国，无所畏惧的决心。《宣言》说：

“窃自谓，既以言论贡献社会，即当服膺新闻家之信条，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永矢无谖，无敢或贰。且舆论之为国家重也久矣！方今朋良在上，政治休明，而同人屡以直言极谏获戾，此虽同人之辱，而实非同人之辱也！同人惟抱定此旨，故复有《大公报》之组织。今当发行之始，其旨趣有足为吾父老告者：民国成立

^① 长沙《大公报》1915年9月1日。

于今四年……当此强邻生心、鲁难未已之秋，岂容发为摇动国体之谈，以希冀个人不可知之富贵而酿亡国之祸……今报界同业窃多有极力鼓吹之者，本报则断断不附和之。惟知以拥护共和、巩固国家为帜志，此本报之旨趣一也……惟以大公无私之本怀，发表中立不倚之言论，据事之书，有闻必录，此本报之旨趣二也……本报发行湖南……愿于湖南各重要问题为根本解决，并多论到随时发生之事实，以作刍蕘之献，而尤注重整顿今日之颓风败俗。至于本省新闻，则多聘重要访员，力求确实采择精审，扩充篇幅，毋敢以影响偏蔽之辞，作同异上下之术，此本报之旨趣三也。”^①

该报创刊的第一天，编辑部同人即表示坚决反对复辟帝制。《本报对于国体问题之主张》的时评，就写道：“夫以少数人之私意，遂欲假造民意以变更四万万人口之心意，倾覆共和国体，姑无论其狂妄，即其举动，真谓狗彘不食也，本报誓当秉春秋之笔以诛之。”据龙兼公的儿子龙念慈回忆：“《大公报》创刊之时，正值袁世凯欲行帝制。湘人杨度等秉承其意旨，大肆活动，阴谋改变国体，《大公报》同人同仇敌忾，即标榜坚决反对帝制以为办报宗旨，并准备牺牲以殉。时汤芑铭督湘已预备劝进；湘人叶德辉等发起筹安会以张之，某报竟缄默不言，《发报》则为帝制机关报，狂肆日甚。独《大公报》于八表皆昏、百舌尽反之际，奋笔击之，为共和抗争不已之鸣声；全省不赞成帝制者，咸誉为昏夜明星，帝党则深嫉之。十月，湘政府以《大公报》反对激烈，迭令警厅传语戒饰，警厅并每日派员来馆检查，后《大公报》又连续披露筹安会制造民意秘电数通，更为帝制派所痛恨。于是湖南

^① 长沙《大公报》1915年9月1日。

筹安会电京告密，谓《大公报》为帝制进行之障碍。袁世凯即电令汤芗铭、沈金鉴严拿惩办，且销毁该报馆……时湘人张树勋任警察厅长，颇为《大公报》道地，得未封闭，社会对该报欢迎之忱，则达于高度，销数突逾四千。十一月帝制已成事实，全国反袁斗争如火如荼，《大公报》自不遗余力，鸣鼓猛攻。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在万民声讨之下，不得已申令撤销帝制，不久，这遗臭万年的窃国大盗便忧惧而死了。”在这场反帝制斗争中，《大公报》以大无畏精神，赢得了湘民的信赖，以至有“褒诛一字抵千城，大道为公明自生。奋力扶轮归大雅，不教瓦釜作雷鸣”之誉。正因为《大公报》在湖南坚决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大旗，这类宣传文字之激烈，为当时全国报纸所未有，因而为全省人士所欢迎，不及一月，即发行四五千份，不数月即跃至万份。遂成为湖南新文化宣传的重镇，也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见证。

在宏文图书社和《大公报》的影响下，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高潮。省城长沙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青年学生在1918年4月14日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进而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1919年6月，湖南学生联合会首先出版了《救国周刊》。7月14日，《湘江评论》正式创刊。在学联领导下，长沙各校学生会出版的刊物达十余种。例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明德中学的《明德周刊》，长郡中学的《长郡周刊》，楚怡工业学校的《体育周报》，甲种工业学校的《工学周刊》，都是办得有声有色的学生刊物。此外，还有《湖南教育》月刊、《求新周刊》、《长沙周刊》、《湖南学生杂

志》等等。当时的长沙，号称有“十大周刊”，有人称长沙为“周刊的世界”。此外，《湖南通俗报》也是宣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长沙以外，如衡阳省立三师学生蒋先云等办的《嶷麓警钟》、《先锋》，宁乡云山学校办的《宁乡旬刊》（后改为《沅波》），都是传播新文化的重要媒介。在这些刊物中，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最为彻底。该刊1919年8月上旬被张敬尧查封。

湖南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进步社团也很多。1919年6月朱剑凡、徐特立、陈凤荒等发起组织的健学会，集中了湖南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健学会以输入、研究和传播社会主义等新思潮为宗旨，通过举办学术讲演、介绍西方平民教育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对新文化在湖南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年7月，毛泽东写了《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称赞健学会的出现及其宣传的思潮，是湖南思想界的创举。此期的青年学生社团最多。以省立第一师范为例，影响较大的有崇新学社、明社以及各科的研究会。它们经常以出墙报、讲演、编印刊物等形式，提倡和宣传新文化。长沙各小学的教师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组织了小学国文研究会，推动了湖南小学国文课的改革和文言文的废除之进程。

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是五四运动以后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在省学联领导下，长沙各校学生组织起来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和储金爱国的宣传活动。许多报刊冲破张敬尧政府的禁令，刊载了大量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其中以《湘江评论》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最为彻底。《湘江评论》著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不是什么“人道”、“公理”的胜利，而是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打

倒了德奥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创刊宣言》号召中国人民以罢工、罢课、罢市、排斥日货种种运动,对付日本,粉碎它的侵略野心。这一号召,在湖南人民中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在反日爱国斗争中,各地出现了许多宣传反帝思想的新剧、诗歌和漫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激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爱国热情。

湖南新文化运动也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内容涉及反对封建主义教育,提倡民主主义的平民教育;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精神;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等等方面。当时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和批判封建教育制度的文章,指出当时的教育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旧时的专制及科举的余毒,是“贵族的、束缚的、因袭的、虚伪的和自私的”教育,因而要求变贵族的教育为平民的教育,变因袭的教育为创造的教育,变虚伪的教育为真实的教育。同时还指出,学校是社会的组织,学生必须与生产结合。在反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的推动下,湖南各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以省立第一师范的改革最著成效。在校长易培基的主持和推动下,第一师范不仅改革了人事、管理制度,还革新了教育内容和方法。他们请来许多新派人物及国内外名流学者来校讲学,扩大师生的眼界,增强开放意识。第一师范一时出现了社团林立、研究成风和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师的改革也推动了整个湖南教育界的革新。一师毕业的学生分散到各地后,也促进了全省小学教育的改革。

1919年11月14日,在长沙发生赵五贞女士因不满包办婚姻,在花轿里自杀的事件。第二天,长沙各报刊登了这一旧礼教吃人的消息,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从而把湖南反封建礼教的斗争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界、新闻界人士纷纷著文,对封建礼

教进行鞭挞。毛泽东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9篇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赵女士自杀“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造成的；指出这是那个黑暗野蛮社会的必然产物。1920年10月19日又发生周南女校学生袁舜英不堪丈夫虐待投水自尽的事件，再一次使广大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封建礼教的可恶，认识到教育和经济的不发展，是导致妇女在社会上无法立足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校长朱剑凡对周南女校进行了改革，鼓励学生自治自强，成为自食其力的人。长沙各女校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积极参加谋求妇女解放的运动。省立第一女师发起成立了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趁制定湖南省宪法的机会，发表宣言要求“省宪”规定女子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婚姻自主权和财产继承权等，并派代表参加了省宪法审查委员会。

破除封建迷信、提倡科学精神，也是湖南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为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健学会的朱剑凡等人多次发表演说，批判“宿命论”、“偶像崇拜”、“人死有知”以及为死人殉葬等迷信思想。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不信科学便死”的文章，号召人们破除迷信。《大公报》还开辟专栏向群众普及各种科学常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一些封建卫道者组织了反动的孔道大同社和神道杂志社，公开向新文化团体挑战。军阀张敬尧也在长沙天天祭神，宣传神道，妄图用所谓“宣传教化、励行善道”，来挽救他们传统思想将亡的“厄运”。于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斗争更加激烈。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后期，涌现了一批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及其进步团体，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也逐渐出现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毛泽东

《民众的大联合》，《大公报》发表的《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等等文章，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驱张运动胜利后，谭延闿、赵恒惕为了维护其统治，宣布“湖南自治”，各种新的团体乘机而起，新的书报自由贩卖。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1920年7月，毛泽东、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邀集长沙教育界、新闻界人士赵运文、朱剑凡、龙兼公、张平子等人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缘起》指出：当时的湖南，还没有真正的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中国一样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才能算是真正的新文化。文化书社的宗旨就是传播新文化，要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和推销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作为青年及湖南人研究的材料。书社推易礼容为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并聘请李大钊、陈独秀为书社的“信用介绍”。书社成立后不久，与省内外建立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处。销售的新书刊有：新文化书社丛书、哲学丛书、晨报社丛书、新潮丛书，和《新青年》、《劳动界》、《少年中国》等各类书刊，以及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报纸，还有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中国青年》，中国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等。1921年1月后，文化书社先后和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隆回、溆浦设立分社，在长沙、衡阳等地设立贩卖部，对于新书报的宣传介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湖南的迅速推销，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8月，毛泽东和彭璜、姜济寰、何叔衡、贺民范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

务内容。该会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彭述之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后来去俄国留学。研究会主要在报刊上发表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开展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等一系列纪念活动，对于湖南社会各界了解苏俄情形，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邀请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报》，聘请熊瑾玎、周世钊任编辑。该报刊登了许多记述本省各地劳动、教育、实业状况的调查资料和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通信，也介绍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湖南无政府主义者黄醒等人创办的健康书社，在推销无政府主义书籍的同时，也销售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在新文化运动中，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湘讲演，也是向地处内陆的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如江亢虎、罗素、杜威、蔡元培、张继、吴稚晖、李石岑、杨端六等资产阶级学者，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等先后来湘讲学或游历，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而且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批判，起了重要的作用。

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也是湖南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在中国招收了10万华工作战争勤务。当时在法留学的吴玉章及蔡元培等人创办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后来组织法华教育会，来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积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先是派蔡和森赴北京接洽联系，后来毛泽东等到北京协助开展湖南留法运动。在长沙，1919年10月，长沙青年学生联合教育界组织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12月，向警予、蔡畅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出